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

A Study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900—1937)

朱慧颖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

A Study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900—1937)

朱慧颖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 : 1900~1937 / 朱慧颖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 11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 万新平主编)
ISBN 978-7-5528-0281-8

I. ①天… II. ①朱… III. ①公共卫生—卫生管理—
研究—中国—1900~1937 IV. ①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679号

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 (1900 - 1937)

朱慧颖/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22 千字

2015 年 3 月 第 1 版 2015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81-8 定价: 42.00元

本书以近代天津社会的医事管理、环境卫生、卫生教育以及防疫机制等为关注对象，在厘清史实的基础上探讨以下问题：卫生如何从个人私务演变为政府的责任之一，政府如何管理人们的健康事务，在医学现代化过程中中医、产婆等传统医疗从业者有何遭际，防疫机制怎样形成，卫生知识如何向民众传输，卫生行政如何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又作何反应等。

责任编辑：王宇英

封面编辑：鞠佳美

总序

万新平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期盼已久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通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辑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所谓“近代中国看天津”就是对天津近代重要历史地位的一种通俗的概括。比如,天津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汇纳百川、包容中

外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发展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宜居城市,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天津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强大引擎。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使天津的演变成为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所以,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与周边地区,乃至与华北、西北、环渤海地区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

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天津的外国租界、领事馆、教会活动的文件、报告、调查和私人日记、信件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中关于天津的记述,以及反映天津历史的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近代卫生行政在天津的出现及其演变	20
第一节 天津近代卫生行政的出现	20
一、西方市政卫生机构的引进	20
二、从卫生总局到防疫处	23
三、行政理念的变迁	26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天津卫生行政	27
一、分合无定: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置	28
二、卫生计划: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31
三、耳目作用:卫生稽查员警	34
第三节 基层卫生行政:卫生区事务所	36
小 结	43
第二章 近代化的医事管理	44
第一节 官方医疗机构:从缺席到创设	44
第二节 政府对医药管理的介入	49
一、行医资格的考核与认定	50
二、对药业的管理	57
第三节 医政问题的社会反应	61
一、医药界的反应	61
二、民众的态度	66
第四节 接生婆、助产士与生育管理	69
一、传统产婆的正规化	70
二、现代助产士的培养	74
小 结	78

第三章 防疫机制的形成与运作	79
第一节 近代卫生防疫的初步发展	79
一、近代天津的疫病	80
二、防疫机制的初创与发展	81
第二节 卫生防疫的程序化	85
一、传染病医院之设	85
二、1932年:虎疫来袭与各界防疫	87
三、传染病管理程序的确立	101
第三节 种痘:预防性公共卫生措施	103
一、天津早期种痘事略	103
二、防天花与开民智:种痘的进一步推广	105
第四节 防疫视野中的饮食卫生	110
小 结	117
第四章 环境卫生:清道、公厕兴建与粪秽处置	119
第一节 清道:环境卫生的重心	119
一、清道组织与清洁费	120
二、清道计划	124
三、市政还是卫生	127
第二节 公厕:便溺行为的重塑	130
一、如厕陋习及其变迁	130
二、公厕的兴建与整顿	133
三、公厕的承包经营	140
第三节 改良与因循:粪便和秽水处置	142
一、粪秽处置与水粪两业	142
二、改良与因循:粪秽处置的变革	147
小 结	152
第五章 造就国民健康的身体:学校卫生与卫生运动	153
第一节 学校卫生的开展	153
一、官方对学校卫生的规划	154
二、学校卫生概观	157

第二节 小学卫生教育	161
一、卫生教科书的刊行及其特点	161
二、学童的卫生认知与卫生训练	164
第三节 全民动员的卫生运动	169
一、卫生运动的组织方式	171
二、卫生宣传:讲演、电影与展览会	172
三、清洁运动	175
四、灭蝇运动	178
五、余 论	181
第四节 社会力量与卫生宣教	184
一、青年会的例子	184
二、报刊的宣传引导	189
小 结	192
结 语	193
参考文献	198
附录一 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清洁道路沟渠	210
附录二 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管理居民清秽规则	212
附录三 污物扫除条例(1928年颁行)	213
附录四 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1928年颁行)	214
后 记	215

前言

卫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探察城市公共卫生的历史面貌,不仅是打开一个窥视社会变迁和城市发展的窗口,亦能为当下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借镜,不失为一个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的课题。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基础

以一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演进为论文选题,最初仅仅源于一种好奇。在南开大学食堂,有专人将餐盘中的剩余饭菜收回并倾倒入大桶中,然后由汽车运出校园。虽然不知这些俗称“泔水”的残羹剩饭运往何处,但这种回收废弃物,维护校园环境的方式,使笔者在某次旁观之后突然产生一个疑问,历史上的城市居民如何处置这类生活废弃物?如何使自己的城市看上去干净整洁?经过一个阶段的文献阅读后,笔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可以归属公共卫生范畴,而且处置废弃物其实仅为公共卫生的一小部分。不仅如此,笔者也发现,“卫生”是个曾经承载了许多内容的话题。首先,清季亡国灭种的危局日益迫近,“保种”“强种”观念应运而生。有识之士认为,保种强种的门径之一是讲求卫生,培养健康强壮的国民。翻检当时的报纸杂志,这样的言论殊不鲜见。例如,有论者认为:“今天下竞言强国矣,而不知种类积弱则不能强其身,即不能强其家,又安能以强其国。”那么如何才能由“强身”而至“强国”?普及“卫生学”作为一种方法被郑重提出,具体做法是:“官府实行于上,绅商协力于下,互相开导,使人人皆知此身为国家之一分子,有万万不容薄待者,始可收强种之效于无形。”^①又如,“普及卫生思想,是以国民保天然之寿,乡堡少瘟疫之灾,家国享久远之幸福。体强则志强……种类于是乎亦强”^②。可以说,在保种强国的强烈

① 《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录六月二十二日《汉口日报》),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8期,第178页。

② 《论说·论奉省宜整顿医学考究卫生》,载《盛京时报》,1906年12月5日。

诉求之下,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甫一起步即担负着非常严肃的使命。“卫生”的意义,“小之关乎国民之健康,大之系乎国势之强弱”^①。这种论点在民国时期被一再重提。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国民衣食住行的卫生整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借此重塑国民的体魄与精神,内兴民族,外御强敌。由此可知,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卫生,尤其是与个人卫生相对的公共卫生的提倡与建设,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与独立、人民健康及文明形象的塑造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公共卫生也和民生及社会经济相互依存。从小处说,人一有疾病,姑且不提疾病本身给人造成的身心痛苦,得病后人即无法做事谋生,不得不求医问药,从生产者一变而为消费者,其家庭难免遭受直接损失。推而论及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有数百万这样的病夫,他们能为国家服务的时间因病或者死亡而缩短,国家的经济损失当然可观^②。而如果能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工作能力提高后所得的无形利益则足以抵偿用于卫生事项的费用并且有余^③。因此,健康实为一家一国的资产,健全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家国维系中起着积极作用,是通向国民健康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即便在当今社会,如何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是公共卫生事业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西方有谚语云“上帝造人,人造城市”,生动地表明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形成后,自然会产生收治疾患、预防时疫、提供安全饮水、处理粪秽垃圾等问题。卫生行政是都市重要行政之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虽然出现较迟,但一经出现即逐步影响人们的卫生观念和生活,改变传统城市的面貌。正如城市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的宏观研究应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如果微观研究十分薄弱,就难以为宏观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④,通过考察卫生行政的内容、运作机制、成效和影响等等,可以增进我们对城市管理和人们日常生活历史细节的了解,为宏观面相的城市史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在大小城市竞相争创卫生文明城市的今天,并不遥远的历史或许也能发挥一定的借镜作用。正

① 汪翔:《丛录·满洲鼠疫谈》,载《盛京时报》,1911年3月14日。

② 杨济时:《建设时代之公共卫生》,载《中国卫生杂志》,1930年10月第21期。

③ 李廷安:《学校卫生概要》,载《大公报》,1930年5月10日。

④ 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与展望》,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从最初单纯的好奇逐渐转变为认真的探索求知。

至于本文以天津为关注对象,主要原因在于天津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专门卫生行政机构、追求卫生现代化理想的的城市之一^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成立的卫生局,是西方市政卫生组织的移植,使近代天津的公共卫生事业一启动即站立在较高的起点之上。从新政时期直至国民政府时期,天津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虽屡有更迭,但市政卫生管理不辍,成效也不乏可观之处。此外,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有着比较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其公共卫生机制的运作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人说,“近代中国看天津”,在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新与旧、中与西、发展与停滞、革新与守旧……许多对立冲突或和平共存也在天津、在公共卫生这扇小窗口绘出一道道历史景观。当然,无米难为炊,选择天津也和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对比较丰富有关。

早在民国时期,一些倡导公共卫生的医学专家已着手对我国卫生行政的历史沿革作了细致梳理。如方石珊陈述了上起周朝,下迄北伐告成定都南京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卫生行政的发展概况,其中对民国以前各代重在胪列医政职官,对民国时期则侧重介绍卫生行政机构的沿革和各科职掌。俞松筠除考察西方卫生行政的历史,也缕述中国从周至清各代的医药制度和新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并将近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划分为萌芽期和生长期,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加以介绍^②。不过,被认为是“作我国卫生制度史”的“第一人”的则应为马允清^③。其著作广为搜罗各种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详细叙述了从太古时代直至近代中国医药事业的变迁。这些早期的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卫生行政的发展史,但所谈内容单一,虽名为卫生制度或卫生行政,实际基本只涉及医政,与通常意义上的“卫生”相较,范围失于狭窄,而且行文以史乘的钩稽为主,缺乏学术性的论证分析。

① [美]罗芙芸(Ruth Rogaski)在《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作舟译,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一文中提出,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天津的市政管理当局一直把由国家管理的卫生现代化当做实现的目标。

② 方石珊:《中国卫生行政沿革》,载《中华医学杂志》,1929年第14卷第5期;俞松筠:《卫生行政之史的回顾》,载《社会卫生》,1946年第2卷第4期。

③ 马允清:《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蔡颖之《序》,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版,第3页。

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在阶级斗争、军事、政治等的历史研究蔚然成风的情形下,公共卫生研究显得阒寂无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公共卫生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城市公共卫生而言,上海可谓是研究热点。除了较早的程恺礼之外^①,安克强在其省思市政权与现代化的专著里概括了上海市政当局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活动,并另著文分析了上海租界的性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②。韩国学者裴京汉观察了1927—1937年上海公共卫生法制化的过程,并归纳了法制化的具体内容,以此来审视上海社会的“近代秩序”^③。另有一些中国学人的专题研究成果散见于报纸杂志。陆文雪探讨了工部局建立、发展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过程及其在上海的适应性问题。何小莲也以上海租界为中心论析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近代化,认为上海租界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在污水排放、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文章最后还指出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步履缓慢的若干原因,但限于篇幅,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刘岸冰考察了近代上海环境卫生管理的历史沿革、机构、制度和措施,并分析了环境卫生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④。和多数研究偏重于史实的罗掘有所不同,胡成围绕中外双方关于华人“不卫生”的讲述,从话语和意象的角度阐发了与此讲述密切相关且不断演化的思想与行动^⑤。此外,彭善民把公共卫生的发展

① 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1987.

② [法]安克强著,张培德、辛文锋、肖庆璋译:《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52页;徐新华译:《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文收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66页。

③ 文章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卫生”为题作为一节,载于作者《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15页。

④ 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载《史林》,1999年第1期;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刘岸冰:《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载《史林》,2006年第2期。此外,朱德明勾勒了近代上海租界的卫生行政机构、医院、中西药制销业、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五大方面的概貌,见朱德明:《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1期。

⑤ 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6期。

视为都市文明增进的过程，以此展开对上海近代公共卫生发展与变迁的研究^①。

杜丽红先后发表了数篇有关近代北京公共卫生问题的论文，其中有对北京城市道路清扫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事务的实证研究，也有对清末北京卫生行政官制的建立、卫生行政法规的颁布执行等史事的系统梳理^②。她还就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粪秽的收取和处理，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粪业改革这一复杂而有趣的历史事件^③。韩国学人辛圭焕更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个“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渗透的典型事件”^④。饭岛涉纲要式地梳理出从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北京卫生事业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制度化始于20世纪初的观点^⑤。杨念群检视了北京自20世纪20年代建立西方卫生示范区之后，将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生与死纳入现代医疗卫生网络体系中的过程，指出20年代西方卫生示范区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在《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中，作者更以宏阔的视野、独特的剪裁和论述方式，探索了医疗卫生的诸多面相以及交错其中的政治演变，其研究理路和叙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⑥。除了京沪两大城市，苏州、武汉、广州等城市的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如周瑞坤观察了广州城的卫生组织与卫生设施、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情

① 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作者惠赠稿。陈蔚琳、刘雪芹等以上海公共卫生状况或瘟疫与社会的互动为选题撰写了硕士论文。

② 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探析——对北平环境卫生管理的实证研究》，载《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8页；《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见2006年8月南开大学“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322—335页。

③ 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④ [韩]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和环境卫生的改革》，见2006年南开大学“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287—302页。

⑤ [日]饭岛涉：《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之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卫生”》，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4页。

⑥ 杨念群：《“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况,探究了它们对广州城市近代化以及政权形塑过程的影响。张海林在论述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时,也注意到了早期苏州警察纠察市容卫生和医药事业的职责,以及卫生机构的成立^①。

天津的一些学者也没有忽略天津公共卫生的历史陈迹。如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曾谈到清末天津的卫生保健和环境卫生治理。宋美云提及天津商会对城市疫病防治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参与。张利民、刘海岩等概述了天津的卫生管理。王先明等在分梳清末警察的社会角色时,也论及天津警局在城市卫生方面的规定。侯杰从近代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究明《大公报》在20世纪初天津城两次瘟疫防治中的作用。任云兰陈述了民国时期天津官方和民间在进津难民中开展的卫生防疫工作^②。由于上述作者的研究本身并不聚焦于卫生事业,因此他们的阐述是片段的、零星的。

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完稿于1996年的博士论文^③,是迄今为止与本文选题直接相关的论作。作者选取英国医生到达大沽的1859年作为论述的起点,止于1953年的爱国卫生运动,考察了这一时间跨度内,“卫生”概念在天津这个华北口岸城市的变化:“卫生”的字面意义为“保卫生命”,最初被定义为个人用以预防疾病的方法。随着20世纪初数十年间

① 周瑞坤:《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s)》,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未刊稿;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9、147—150页;周启明:《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②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4、318—319、331、345页;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336页;宋美云:《论城市公共管理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6页;王先明、张海荣:《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任云兰:《民国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1912—1936年)》,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Ruth Rogaski: *From Protecting the Body to Defending the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 1859—1953* (《从卫生到爱国: 公共卫生在天津的诞生, 1859—1953》),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6, unpublished.